



# 七七事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扩张与列强应对初探

隆鸿昊

**内容摘要** 日本“华北驻屯军”组建于1901年,是《辛丑条约》的产物。1911年,日本试图趁中国辛亥革命内乱之机,向华北增兵,扩充驻屯军实力,但遭到了列强的反对。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期间,日本利用与列强共同防卫华北的机会,在英美等国的支持下,增加了驻屯军的兵力。1935年,日本制造“华北事变”,阴谋分离华北,随即在列强的默许下,于次年将驻屯军编制升格,扩充驻军人数,并不断在北平丰台等地向中国军政当局进行军事挑衅,最终导致七七事变的爆发。

**关键词** “华北驻屯军” 列强 七七事变

日本“中国驻屯军”,是其根据《辛丑条约》获得的在中国境内驻扎军队特权的产物,成立于1901年,原称“清国驻屯军”,辛亥革命后,改称日本“中国驻屯军”,因该军主要在华北地区,又称“华北驻屯军”。日本“华北驻屯军”成立后,利用其特殊地位和享有的“权利”,在此后三十余年的时间里,不断扩大编制与人数,非法扩建兵营,在中国犯下累累罪行,充当了侵华急先锋的角色。目前,学术界对“华北驻屯军”的研究,主要单纯地论述其对中国的政治、军事以及经济上的侵略活动<sup>①</sup>,而对于驻屯军历次增兵、扩大侵略时,列强的态度如何、支持与否,则缺少系统地论述。基于此,本文试以1911、1927、1936年“华北驻屯军”的三次增兵为例,来探讨日本扩大对华北的侵略与列强如何应对之间的相互关系。

## 一、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增兵华北的尝试与列强的应对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1901年9月7日,清庆亲王奕劻与直隶总督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等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条约规定列强有在北京东交民巷使馆区以及从山海关至北京沿途十二处要地驻军的权利。其第七款规定,“中国国家应允,诸国分应自主,常留兵队,分保使馆”;第九款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sup>②</sup>。此前,各国指挥官已在德国陆军元帅瓦德西的召集下,于

<sup>①</sup> 关于“华北驻屯军”对中国侵略活动的相关论文,参见王萌《1936年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增兵、升格及其后果》,《史林》2015年第4期;张宗平《日本中国驻屯军的由来、演变及罪行》,《北京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武月星《日本华北驻屯军及其侵华行径》,《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4期;张洪祥《“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历史教学》1982年第10期。另日本学者樱井良树所著《华北驻屯日本军:義和團から盧溝橋への道》(岩波書店2015年版)以及古野直也所著《天津驻屯军司令部1901-1937》(国书刊行会1989年版),对七七事变前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沿革也有论述。

<sup>②</sup> 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1006页、第1007页。





当年4月举行会议,商讨各国具体的驻兵地点及人数。这次会议决定,将军事占领分为两个阶段,即“过渡时期”与“平常时期”,在“过渡时期”,联军总数为12200人,其中日本驻军为2600人,分驻北京300人,山海关、秦皇岛300人,天津1400人,滦州300人,昌黎300人,另在塘沽驻有一支小部队<sup>①</sup>。等“过渡时期”结束,正常秩序恢复后,联军总数降为8200人,其中日本驻军缩减为1650人,其驻地不变,只是将天津的驻军减少到450人<sup>②</sup>。根据这一协议,同年10月24日,日本“清国驻屯军”编成,首任司令官为大岛久直中将,驻屯军司令部设天津,主要任务为“保护公使馆、领事馆及本国公民,其目的是维持首都和滨海间的交通自由”<sup>③</sup>。此后十年间,“华北驻屯军”的兵力有所减少,1908年底,驻屯军开始实施“减兵令”,到了1911年6月,其兵力已缩小至530人<sup>④</sup>。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对时局发展极为关注。在革命初期,日本决定采取暂时维护清朝政府的态度,以换取清廷承认日本在华的优势地位,获得更多的权益。10月24日,日本内阁召开会议,认为“鉴于帝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与清国之间具有极密切之关系,故我政府应不断努力,以求对清国占有优势的地位,并须多方策划……今后应着重致力于在清国本土培植势力,并努力设法使其它各国承认帝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同时指出,“要尽可能不伤害清国的感情,并设法使清国对我国寄予信赖”<sup>⑤</sup>。根据这一政策,当清政府秘密委托日本驻北平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少将,代向日本政府紧急购买军火时,日本外相内田康哉立即做出了积极回应,指令驻北平公使伊集院彦吉,“帝国政府鉴于清国政府为剿讨革命军而急需枪支、弹药等迫切情况,已决定由本国商人设法供应,予以充分援助。为此,已经采取各种必要措施”,并在电文中特别强调,“帝国政府对于清国政府始终抱有深切同情,且有实力仗义执言,此次提供支援,即一良好例证”<sup>⑥</sup>。

除了向清政府提供军火援助外,当时日本的军政界高层,还试图趁中国内乱之机,出兵华北地区,扩充驻屯军兵力,以控制中国核心区域。10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在给外相内田的电报中,对中国的形势进行了详尽的分析,指出此时的中国,“民意已完全背离满清朝廷,乃属确凿无疑。现今朝廷已完全丧失昔日统治四百余州的威信和实力,无论采取何种怀柔妥协办法,恐已无法平定目前时局”<sup>⑦</sup>。在这种情况下,伊集院建议,“此际为预防万一,极有必要在旅顺部署军舰,以便能随时迅速驶赴天津和秦皇岛,并须配备优势之兵力,以应其他方面出现重大情况之急需”<sup>⑧</sup>。在此之前,10月13日,日本陆军省军务局长田中义一,在向海军省提出的《关于对清国用兵》的方案中,也指出日本应乘此时机,出兵“占据直隶、山西,领有清国中央地带之资源”<sup>⑨</sup>。

由此可见,辛亥革命爆发后,在革命初期,日本对华的基本政策,是暂时维护清政府的统治,以保证在华的优势地位,同时伺机出兵华北,增强驻屯军实力,以控制中国的核心区域。

但日本的计划并非一帆风顺。进入20世纪后,日本与英国在1902年至1911年间,签订了三次同盟条约,在此后二十年的时间里,英日同盟成为日本在远东地区扩张的有力工具。但是,由于与英国结盟,日本的对华政策,势必受到英国态度的制约。武昌起义爆发后,最先脱离清政府,宣布

① 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天津志》,博文馆1909年版,第243页。

② 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天津志》,第244页。

③ 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天津志》,第242页。

④ 《軍兵力並配置に關する參考資料の件》(支駐)(1936年3月4日),昭和11年「密大日記」第5冊,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01004192300。原件藏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陸軍省-密大日記-S11-4-10。

⑤ 《日本政府关于对清政策问题的内阁会议决议》(1911年10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09页、第110页。

⑥ 《内田外务大臣致伊集院驻清公使电》(1911年10月1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43页、第44页。

⑦ 《伊集院驻清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0月2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12页。

⑧ 俞辛焞:《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外交史》,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

⑨ 栗原健:《对满蒙政策史的一面——日露戦後より大正期にいたる》,原書房1966年版,第290页。





独立的湖北、江西、安徽等省份,地处长江流域,这一区域正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因此,英国在对待革命党和清政府的态度上极为谨慎,尽量避免贸然干预。11月14日,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在给驻华公使朱尔典的信函中,明确指出:“曾有人问我对有关贷款给满清政府之意见——该政府与我国有正式关系者——我答称目前似不宜贷款给中国政府。鉴于此,本人尤其认为不宜贷款给中国革命领导人。我们一向极为审慎,迄未资助任何一方,因为支持任何一方,皆可能导致另一方的中国人产生排外暴动。”<sup>①</sup>除此之外,当时居住在英国远东殖民地的华侨对革命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英国对中国局势的态度。当时法国在香港的领事馆在给巴黎外交部的电报中,便指出了民众对革命的支持情绪:“香港民众的大多数肯定是支持革命党人的。他们白天无时无刻不在读报纸的评论,连最贫困的苦力,都要在工作中停止一时半刻,读读那些报纸,或者请人念一念。”<sup>②</sup>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给外交大臣格雷的信函中,也提到“鉴于在新加坡和香港的华侨大多同情革命事业,英国尤其可能视此为畏途”<sup>③</sup>。基于这种情况,英国对日本支持清政府,甚至出兵华北增加驻屯兵力的主张,是不赞同的。12月1日,日本驻英国临时代理大使山座圆次郎在拜访格雷时,后者明确告知:“关于清国时局,英国政府一向坚持听任官、革双方自行决定胜负之方针。因此,虽曾屡次有人要求派遣陆军,我政府总是一概加以拒绝,且经常注意避免一切可能挑起排外事端之行动发生。”<sup>④</sup>对日本的出兵计划给予回绝。

除了英国以外,美、法、俄三国对于日本的出兵计划,也并不支持。自《辛丑条约》签订后,美国在华北地区仅驻有很少的部队,最初为150人,1903年降为132人,1907年又降至127人<sup>⑤</sup>,基本为同时期日本驻屯军兵力的十分之一,驻地也仅限于北京使馆区,在华北地区的军事话语权很弱。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能接受日本借机欲再次扩充兵力,甚至出现日本独霸华北的局面。1912年初,美国国务卿诺克斯在致德国驻美大使的照会中表明:“从目前骚乱一开始,美国政府便不时同其他有关大国,特别是同英、法、意、日、俄以及德意志帝国政府就保卫共同利益的最妥当方式交换了意见。此种交换意见充分说明,各有关国家一致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坚持一致行动的政策是明智的……今后事态的发展要求外国干涉的可能性并不存在,最近的报告只能使此种看法更为坚定。”<sup>⑥</sup>反对日本单独出兵华北地区。法国此时的外交重心集中在与德国争夺摩洛哥问题上,对中国事务无暇顾及,但其在华的外交官却对革命党人颇有好感。驻华公使斐格在致法国外交部长的电文中,提到“新政府一开始起便致力于维持秩序……如果在外国人中间尚有人担心会在两军即将对阵的战斗中受到伤害,这种担心有些多余……就目前看,这次暴乱有明显的反政府性质,但尊重外国人”<sup>⑦</sup>。俄国的态度也主张出兵华北要谨慎对待,并且要和英法保持一致。代理外交大臣尼拉托夫在给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的信函中,认为“虽然中国局势仍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即为达到我国之政治目的,在俄国领土上采取预备性步骤足矣,但切勿使这些步骤具有过分的示威性质,

① 《格雷爵士致朱尔典爵士函》(1911年11月14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② 《法国驻香港领事馆负责人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年10月19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③ 《朱尔典爵士致格雷爵士函》(1911年12月8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8卷,第149页。

④ 《山座圆次郎临时代理大使复内田外务大臣电》(1911年12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259页。

⑤ 清国驻屯军司令部编:《天津志》,第244至246页。

⑥ 《美国国务卿致德国驻华盛顿大使伯恩斯多夫照会》,陈春华、郭兴仁、王远大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有关中国部分,1911.5—1912.5),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275页、第276页。

⑦ 《斐格致外交部长先生》(1911年10月16日),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7卷,第207页、第208页。



切勿造成借口,使中国发生的反皇朝运动转向仇外”<sup>①</sup>。驻华公使廊索维慈在给彼得堡的报告中指出,“对我们说起来,无法去明显反对我们友好的法国和英国的愿望,一系列头等重要的政治问题,把我们同它们联系在一起”<sup>②</sup>,并不赞同日本出兵华北,扩充兵力。

由于列强的一致反对,最终日本在派兵问题上,只能做出“帝国政府不仅认为尚未到达可以做出此种决定之地步,同时认为赖以做出此种决定之根据,即对清国形势之判断,目前尚不明确”<sup>③</sup>的决策,放弃了大规模向华北增兵的计划。尽管如此,“日本并没有放弃派兵的念头,还是再三强迫要求英国承认关外铁路由日本单独防护;在这个当口,美、德等国家也都唯恐‘搭迟了巴士’而向英国提出参加。结果,英国表示让步,决定关外地区由日本和俄国商洽之后单独防护;关内由列强分段负责,共同防护。照英国当初的规定,是由英、日、法三国负责;但经过如上所述的一些折动之后,在翌年1921年1月间所签订的‘防护铁路协定’,便增加了美、俄、德三国,而共为六国。根据协定,日本很成功的得到自山海关至滦州一段的六十一公里地区,配置了五百九十九名的防护兵员”<sup>④</sup>。

综上所述,辛亥革命期间,日本出于保证其在华优势地位的考虑,采取支持清政府的政策,同时伺机出兵华北,增强驻屯军实力,以控制中国的核心区域,但由于英美等列强的反对,日本大规模出兵华北的动议并没有实现,但最终还是借防护铁路的名义,与英国达成妥协,变相地增加了“华北驻屯军”的兵力。

## 二、北伐时期日本强化华北防务与列强的支持

20世纪20年代,中国展开了推翻北洋军阀统治的国民革命。1926年6月,广州国民政府誓师北伐,很快便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1927年3月22日,北伐军占领上海,24日,占领南京。就在北伐军占领南京当日,城内却发生了针对外国人的骚乱,从上午8时延续到下午5时,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及外国教堂、商店、学校等都遭到了抢劫,并出现了外侨致死、致伤的情况,是为“南京事件”。事后,国民政府对事件进行了调查,认为骚乱是北洋军阀余部所致。时任北伐军第六军军长程潜在其报告中写道:“南京有反动份子,乘秩序未定之际,煽动逆军余孽及地方流氓,对于外侨掠夺财产,焚烧房屋,并有伤害生命事情,致英美军舰发炮轰击下关及城内。”<sup>⑤</sup>然而,列强并不认同这一说法,4月11日,驻南京的各国领事在给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的声明书中指出,“三月二十四日,民军入南京城,同日午前午后,均有正式服装之民军组织的军队,对于外国之领事并侨民之身体财产为组织的暴动”<sup>⑥</sup>,认为骚乱是北伐军所致。

此次事件,无论是北洋军阀所致,还是北伐军所致,均在列强内部引起了恐慌。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深刻记忆,事件发生后,如何确保京津地区使馆及外侨生命财产安全,便成为列强重点考虑的问题。3月29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给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便指出,“在华北地区的美国人在任何情况下将发现他们与在国民党控制区的人一样不安全。现在在任何可能的情况下,将华北

① 《代理外交大臣致陆军大臣苏霍姆利诺夫》(1911年11月4日),陈春华、郭兴仁、王远大译:《俄国外交文书选译》(有关中国部分,1911.5.—1912.5),第191页、第192页。

② 复旦大学历史系《沙俄侵华史》编写组编:《沙俄侵华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28页。

③ 《内田外务大臣致伊集院驻清公使电》(1911年11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115页。

④ 李云汉:《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82年版,第369页。

⑤ 《程潜之报告》(1927年3月25日),《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第95页。

⑥ 《英美法意日五国代表向陈友仁蒋介石提出之条件及声明书》(1927年4月11日),《东方杂志》第24卷第7号,第96页。



的美国侨民撤到北京或天津,以便加以保护或撤离,显得很有必要了”<sup>①</sup>。4月10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再次召开会议,对华北整体形势交换意见,会上,各国公使一致认为,“广东人到达华北以及北京,将会给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最严重的恐慌……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相信,他们应该督促他们各自的政府,迅速采取措施,确保居住在北京和天津外国人的安全,在那里,现有的兵力很明显不足以承担防卫战略要点的任务”<sup>②</sup>。可见,此时列强已经有了向平津一带增派部队的意图。

长期以来,英国一直是在华最大的利益受益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国力下降,此时的英国深感仅仅依靠自己的力量不能确保华北的安全,认为必须与其他国家合作,才能维护共同的在华利益,日本便被当做一个首选的对象。早在“南京事件”发生后第四天,即3月28日,英国驻日大使蒂利便明确告知日本政府:“英国不会也不将保护除上海以外的任何殖民地,比如天津,因此在面临巨大威胁的时候,英国期待日本对华北地区给予更多的保护。此外,日本应该在华北地区承担所有的军事责任。”<sup>③</sup>3月30日,英国外交部指令驻华公使蓝普森,让其转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由于英国已经在上海地区为保护各国的联合利益提供了数量最多的部队,因此各国理应依赖日本政府对天津的外国利益提供足够的保护”<sup>④</sup>,并请芳泽催促日本政府采取任何必要措施,希望日本能够尽快出兵华北,增强其驻屯兵力,以防卫北伐军可能带来的威胁。

就在英国要求日本加强华北地区防务的同时,中国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与已经迁都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呈对峙状态。由于此时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态度并不了解,因此不愿贸然出兵华北。4月16日,日本外务省与军方召开了针对中国形势的联席会议。会上,外务省对于防卫天津的态度极为谨慎,认为日本没有任何借口派遣大量部队进入天津。如果日本那么做了,那将会惹恼整个中国民众,而军方也没有对外务省的观点持任何异议<sup>⑤</sup>。4月20日,日本若槻内阁倒台,军人出身的田中义一继任首相并兼任外相,但田中上台后,在出兵华北问题上,却继承了前任内阁的谨慎态度。5月5日,前任内阁外交顾问永井柳太郎在国会发表演说,质询田中的政策,田中回复道:“我认为关于我向中国派遣部队的观点存在一些误解,我始终认为在派兵问题上需要谨慎。”<sup>⑥</sup>5月13日,英国驻日大使蒂利面见田中,向他征询面对中国民族主义情绪该采取何种措施,以及该如何保护英日现存利益,田中表示,“中国的态势变化太迅速,很难形成一个决定性的政策,他仅愿意就任何个别问题与英国讨论”<sup>⑦</sup>。与此同时,田中还告知来访的蒋介石私人代表蒋百里,希望北伐军在徐州停止前进,暂缓北伐。可见,此时田中认为,只要北伐军不进入到日本拥有重大利益的山东地区,日本便不打算响应英国的号召,出兵华北。当时出版的中国报纸,对田中的这一态度也有报道:“辛丑条约国因增兵华北问题,日前迭有非正式会议。据闻英国对增兵一层,鼓吹甚力,日美两国尚取冷静态度……当时因意见不同,毫无结果而散。”<sup>⑧</sup>

但是,中国的北伐进程并非按田中所愿。5月中旬,南京政府和武汉政府继续北伐,同时冯玉

① “The Minister in China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March 29, 192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27, Volume II, p. 95.

② “The Minister in China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April 10, 192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27, Volume II, pp. 106 - 107.

③ Harumi Goto - shibata: 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 1925 - 31, Macmillan press, 1995, p56.

④ Harumi Goto - shibata: 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 1925 - 31, p56.

⑤ Harumi Goto - shibata: 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 1925 - 31, p57.

⑥ 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 - 1939, Volume8, 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 1991, p279.

⑦ BDFA, Part II, Series E, Asia, 1914 - 1939, Volume8, p282.

⑧ 《列国对华北增兵问题:使团会议无结果,或将取个别行动》,《晨报》1927年5月24日,第2版。





祥的国民军也自西向奉军发动进攻。面对北伐军的攻势,奉军节节败退,不得不放弃郑州、开封、徐州等战略要地,退守山东和直隶。在这种形势下,田中最终改变了原先的政策,27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决定从关东军抽调2000兵力前往青岛,以护侨为名威慑北伐军。日本政府决定出兵山东的同时,还决定增兵京津,增强“华北驻屯军”的兵力。5月30日,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告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以及法国、意大利以及英国驻华公使,表明日本政府“在形势需要的情况下,会向北京和天津派遣数目相同的军队”<sup>①</sup>,以保护京津一带的安全。当时田中内阁,决定向驻屯军增派5个步兵中队,同时把现有驻屯中的3个步兵中队的回国暂时延期,使“华北驻屯军”的兵力达到8个步兵中队<sup>②</sup>。5月底,日本在北京的驻军由307人上升到800人,在天津的部队由1000人上升至2500人,此外还增加了一支海岸警备队,一支炮兵部队和一支航空部队<sup>③</sup>,使得驻屯军的兵力比原先增加了两倍。

得知日本向“华北驻屯军”增派兵力,强化了华北地区防务的消息后,英国政府欣喜若狂,外交大臣张伯伦在给驻华公使蓝普森的信函中表示:“日本开始把军队派到华北地区,并且在保卫北京和天津地区显示出更为积极的兴趣,这对于英国非常重要,英国外交部对日本政策的变化深深地感激。”<sup>④</sup>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也认为,日本向京津一带加强驻军,使美国摆脱了一种“困惑状态”,“由于一种可以预测但却还不是明显的危险而放弃美国公使馆的行为,是一种对我们利益和荣耀的荒唐牺牲。但是当危险真的到来时再撤离公使馆却为时已晚。我现在的感觉是日本采取的态度极大确保我们抵御任何的现实危险。我可以设定我们能够排除公使馆移出的考虑,以及避免任何义和团事件围攻的重演。”<sup>⑤</sup>除了英美两国外,其他列强对于日本增兵华北的行为也表示出支持和赞许的态度,据《顺天时报》报道,“兹闻昨日上午十时,公使团亦在荷兰公使馆开会,欧登科主席,讨论华北防务问题,当时各使对日本出兵山东及华北一事,皆认为应当”<sup>⑥</sup>。

通过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日本在北伐军逼临山东的情况下,做出了出兵山东的决定,同时增强了“华北驻屯军”的兵力,强化了京津地区的防务,而日本的增兵方针,符合英美等列强的利益,得到了西方列强的明确支持,因此,日本在国民革命军北伐期间,以威慑北伐军,强化华北防务为契机,成功地加强了“华北驻屯军”实力,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

### 三、日本制造“华北事变”扩编驻屯军与列强的默许

1931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地区,不久便将侵略矛头指向华北。1935年5月,日本借口天津日租界内两名亲日报社社长被暗杀,以及热河南部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退入《塘沽协定》划定的“非武装区”,并得到地方政府的支持这两起事件,向国民政府发难。5月29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面见中国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向其提出将“宪兵第三团及类似的团体、军事委员会分会、政治训练处、国民党党部及蓝衣社,有必要从华北撤出。再有,对作为这些后盾的第二师、第二十五师等有害无益的中央军,希望一并撤出”,“对与此次事件

① “The Minister in China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May 31, 192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27, Volume II, p124.

② 陈鹤仁:《中日外交史》(北伐时代), (台北)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9年版,第43页。

③ “The Minister in China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May 31, 192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27, Volume II, p125.

④ Harumi Goto - shibata: Japan and Britain in shanghai, 1925 - 31, p60.

⑤ “The Minister in China (MacMurra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Peking, May 31, 1927,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RUS, 1927, Volume II, p125.

⑥ 《华北防务问题》,《顺天时报》1927年6月1日,第2版。





直接有关的蒋孝先、丁正昌、曾扩清、何一飞等,及无视停战协定精神而与上述各机关通牒,在华北与日本军势不两立的于学忠等,有必要予以罢免”<sup>①</sup>。6月10日,何应钦以口头形式通知日方代表,表示接受条件,但日方并不满足,催逼中方用文书形式答复。7月6日,何应钦复函“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表示“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sup>②</sup>,至此形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通过这一协定,南京中央政府势力被排挤出华北地区。

此次就华北问题的对华交涉,日本军部的本意,是想让关东军与“华北驻屯军”共同负责。由于关东军正在与察哈尔省代理主席秦德纯交涉“张北事件”,因此与何应钦的谈判基本上是由驻屯军单独负责。而“华北驻屯军”早就对关东军过分干涉华北事务而不满:“天津驻屯军方面,对于近在自己眼前的冀东地区的保安队由遥远的关东军幕后掌握,处处感到不便,但也无法可施。更由于关东军在山海关、通州一直到唐山等地都设立了特务机关,把这些地区完全掌握了起来,使天津驻屯军司令部难以进行工作,处处感到掣肘。”<sup>③</sup>因此,可以说,“何梅协定”的达成,不仅提高了“驻屯军”在日本军部中的地位,而且增强了驻屯军操控华北事务的野心。同年9月24日,继梅津美治郎担任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发表对华声明,提出三项原则:(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sup>④</sup>为了对声明做更为详尽的解释,同年,多田骏特意编写了《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的小册子,明确指出:“使华北为中日民众安居明朗之和平乡,中日商品及物资不感危险,而得自由互相流通已存之市场,中日共存共荣之乐土者,实为实施国策之第一步。”<sup>⑤</sup>可见,“华北驻屯军”已经根据自己的设想去规划华北的事务,企图在“自治”的名义下单独掌控华北,使其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管辖,并且不希望关东军再染指这一地区。

此时的日本军部,出于对苏战备的考虑,也不同意关东军过多地干涉华北事务。早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的第二年,即1907年,日本政府便制定通过了《帝国国防方针》,把俄国作为陆军头号假想国。到了20世纪30年代,随着苏联国内的工业化建设,其军队的战斗力也大幅度提升,“进入1934年后,苏军进一步加强国境阵地,远东苏军的兵力日益增多。同年6月左右,约有十一个阻击师团、两个骑兵师团、战车约六百五十辆、飞机五百架。据有关情报称,已有14艘潜水艇进入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远东苏军的总兵力估计约二十三万。日本陆军总兵力大致与此相等,其中在满兵力仅不过三个师团、一个机械化旅团、一个骑兵集团、三个独立守备队、飞机约八十架,兵力不超过五万”<sup>⑥</sup>,可以看出,关东军与远东苏军的实力悬殊甚大。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军部自然不愿关东军再过多参与华北事务,希望关东军专心对苏备战。时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的石原莞尔,便从对苏战略的角度出发,决心一定要阻止关东军参与对华北的工作,强调关东军不能再插手华北工作和交由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处理的必要性<sup>⑦</sup>。正是基于整体战略的考虑,1936年1月13日,日本军部制定了《处理华北纲要》,明确规定“处理华北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负责,实施时,原则上直接以冀察、冀东两当局为对象,并且始终以内部指导为主旨”<sup>⑧</sup>,而

①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宋绍柏、郭林校:《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2页。

②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宋绍柏、郭林校:《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36页。

③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9页。

④ 《多田骏声明》(1935年9月24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78页、第179页。

⑤ 多田骏:《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1935年,第20页。

⑥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田琪之译,宋绍柏、郭林校:《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一卷第一分册,第28页。

⑦ 信夫清三郎著,周启乾译:《日本政治史》第四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50页。

⑧ 《处理华北纲要》(1936年1月13日),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95页。





对于关东军,则“让它在‘满洲国内’,不向华北发展,专心从事对苏国防”<sup>①</sup>。可以认为,《处理华北纲要》的出台,规划了关东军、“华北驻屯军”的战略分工,即关东军在东北地区,专心对苏备战,“华北驻屯军”则专门从事华北事务,这样就授予了驻屯军在华北问题上独立、强势的话语权。但此时驻屯军兵力薄弱,所辖兵力仅有 2003 人<sup>②</sup>,因此对其增兵升格,便成为日本政府下一步势必要解决的问题。

在日本策划“华北事变”,阴谋分离华北的过程中,英美等列强对日本的侵华行径并没有过多的干预。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的美国刚刚遭受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和平主义情绪也十分浓厚,大多数美国人赞成和平主义者不要过问战争的主张。1935 年 4 月 6 日,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十八周年纪念日时,5 万名退伍军人在华盛顿举行了争取和平的游行。4 月 12 日,全美约 17.5 万名大学生举行了一小时反战罢课,在波士顿、纽约、华盛顿、芝加哥和洛杉矶,成千上万的学生走出课堂,提出“要学校,不要战舰”和取消后备军官训练队的要求。一位学生领袖宣布,这次罢课就是“学生们将要采取行动的一次排练,如果美国一旦宣战的话”<sup>③</sup>。因此在这种氛围下,美国当局不想因为中国而得罪日本,尽量避免与日本发生冲突,甚至战争。曾任美国驻华公使,后任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司长的马慕瑞认为,美国面对日本的侵华有三种选择:第一,全力以赴地反对日本;第二,同意甚至参加日本的侵华战事;第三,不对日让步,但也不采取任何积极行动。在他看来,选择一意味着美日开战,选择二意味着对日投降,都不可取,只有态度消极的选择三才是最明智的<sup>④</sup>。时任美国驻日大使格鲁,也持相同的观点,他在 1936 年 2 月 11 日的日记中写道:“应让我国政府的行政部门继续贯彻近年来所奉行的非常明智的政策,即一面步步坚持立场,一面又要避免不必要的摩擦和刺激……在满洲吃闭门羹,我们容忍了;也许这是不可避免的,除非打一仗;日本再侵略中国其他部分,我们无疑也会容忍。”<sup>⑤</sup>而英国的态度也与美国相似,据时任日本驻北平大使馆武官高桥坦回忆,英美对“华北事变”均持观望态度:“彼时英、美等国大使及武官常驻北平,但一般均持观望态度。只有一次,当关东军的重型轰炸机在北平低空飞行示威时,一个平素和我交好的英国武官来到我的办公室说:‘飞机飞得太低了,已影响工作,大使让我来请你们考虑一下。’我说:‘好吧,我转告他们再稍微飞高一点。’英国武官对这个回答很满意。随后我对关东军发出电报,请其考虑国际关系,控制北平上空的飞行,以后飞机没有再来。”<sup>⑥</sup>

由于英美等列强对日本侵略华北的行为采取纵容默许的态度,使得日本可以有恃无恐地按照既定方针增加驻屯军兵力。1936 年 4 月 18 日,广田弘毅内阁颁布陆军第六号令,将“华北驻屯军”编制升格,其司令官职务由原少将级提升到中将级,并改由军部任命为天皇亲授。扩编后的“华北驻屯军”下辖一个步兵旅团、两个步兵联队,另有驻屯战车队、炮兵联队、骑兵队、工兵队等部,总兵力达 5774 人,马 648 匹<sup>⑦</sup>,已然从一支单纯的防守部队升级为攻防兼备的野战军。其具体的增兵前后变化,如下表所示:

① [日]重光葵著,齐福霖、李松林、张颖、史桂芳译:《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3 页。

② 《軍兵力並配置に関する参考資料の件》(支駐)(1936 年 3 月 4 日),昭和 11 年「密大日記」第 5 冊,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CO1004192300。原件藏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陸軍省-密大日記-S11-4-10。

③ [美]罗伯特·达莱克著,伊伟、丁耀林、张震久、陈启迪译,白自然校:《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 1984 年版,第 147 页。

④ 刘世龙:《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261 页。

⑤ [美]约瑟夫·C·格鲁著,蒋相泽译,陈宏志、李健辉校:《使日十年》,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第 172 页、第 173 页。

⑥ 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土肥原秘录》,第 28 页、第 29 页。

⑦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著:《陆军军战备》,朝云新闻社 1979 年版,第 169 页。





表 1 1936 年 2 月“华北驻屯军”兵员分布情况表

驻地	驻屯部队	人员数	驻地	驻屯部队	人员数
天津	军司令部	42	塘沽	塘沽守备队	49
	电信通讯员	55	唐山	唐山守备队	223
	宪兵	21	滦县	滦县守备队	114
	天津驻屯步兵队	600	昌黎	昌黎分遣队	24
	华北派遣山炮兵中队	148	秦皇岛	秦皇岛分遣队	38
	华北派遣工兵小队	69	山海关	山海关守备队	254
	军医院	37	北平	北平驻屯步兵队	271
			通州	通州分遣队	58

人员合计

2003

资料来源:《支那駐屯軍兵力配置並北支駐屯列國軍兵力配置要因送付の件》,昭和 11 年「密大日記」第 5 冊,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C01004194600。原件藏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陸軍省-密大日記-S11-4-10。

表 2 1936 年 6 月“华北驻屯军”兵员分布情况表

华北驻屯军编制	驻地	兵员合计
驻屯军司令部	天津	157
驻屯步兵旅团司令部	北平	7
驻屯步兵旅团 驻屯步兵第一联队	北平	1946
驻屯步兵第二联队	天津	1956
驻屯坦克队	天津	197
驻屯骑兵团	天津	172
驻屯炮兵联队	天津	789
驻屯工兵队	天津	177
驻屯通讯队	天津	196
驻屯宪兵队	天津	78
驻屯军医院	天津	87
驻屯军仓库	天津	12
人员合计	5774	

资料来源:《支那駐屯軍全部隊集結完了の件》,昭和 10~11 年「陸満機密大日記 2/2」,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 C01002711500。原件藏于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陸軍省-陸満機密大日記-S10-2-22。



“华北驻屯军”扩编后,进一步加紧了对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1936年6月及9月,日军先后两次在北平西南的战略要地丰台挑起事端,最终于9月19日强占丰台,中国第29军原驻丰台部队被迫移至赵家庄一带驻防。随后,日军不断在平津一带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据统计,1936年,“华北驻屯军”进行了5次大规模演习,1937年1月至5月,进行了3次大规模演习<sup>①</sup>。自6月起,日军更是以夺取宛平县城和卢沟桥为目标,昼夜不断连续演习,北平局势日益紧张,中日之间大规模战争已经不可避免,最终导致了七七事变的爆发。

#### 四、结 语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开始后,在逐渐实现近代化的同时,也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制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即对朝鲜半岛与东亚大陆进行侵略扩张的政策,而“华北驻屯军”,正是日本在华北地区推行“大陆政策”,扩大侵略的急先锋。自1901年成立后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华北驻屯军”在1911年、1927年,分别以“护路”和“强化华北防务”为名,两次增强驻屯兵力,对华北地区步步蚕食,渐次扩张。九一八事变后,1935年,“华北驻屯军”制造华北事变,阴谋把华北分离出中国,并以此相应地扩大编制,使驻屯军由原来的守备部队,转而成为一支执行战略任务的野战兵团。面对日本在华北的扩张,英美等西方列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基本上对日本的侵略扩军行为采取支持或默许的态度,即便反对,也在一定程度上与日本达成了妥协。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列强对日本的纵容与姑息,助长了其对华侵略的气焰,加速了“华北驻屯军”在平津一带的侵略步伐,最终导致了七七事变的爆发和中国全民族抗战的开始。

【隆鸿昊 历史学博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文博馆员】

(责任编辑:志秀)

<sup>①</sup> 李云汉:《卢沟桥事变》,(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7年版,第296页、第297页。

